

品格教育:课程思政在文科课程中的探索

□ 顾 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中国经典研读(《论语》)”课是思政课程与人文类课程的接榫处,在基础文科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中具有特殊意义。自2012年至今,这门课在清华大学前后经历了三次全方位的革新与重塑。一是在课堂模式上,以圆桌式小班研讨为依托,初步建成文科挑战性学习的有效教学模式。二是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形成“孔子+鲁迅”的融合式教学,以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的智力支持,赢得了学生们的普遍好评。三是将这门课建设成全校通识课,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宗旨为课程注入了灵魂。

[关键词]课程思政;人文基础课;通识课;课程革新;孔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997(2021)02-0033-05

在西南联大教育史上,有一篇重要文献——潘光旦先生的《论品格教育》(1940),开篇就提出“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1]。这一观点与梁启超1914年的演讲《君子》遥相呼应,深刻影响了清华大学110年来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格局。潘先生所谓的“品格教育”,当然包括思政课程,他旗帜鲜明地主张“训教合一”,提出“宣传不是教育”,关注的重心正是要在专业、通识等各类课程中通过“培植”“诱掖”“启发”的方式,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使思政课以外的所有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清华大学的探索与实践已积累了大半个世纪的经验。

清华大学文史哲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前已初步形成“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的通专融合课程体系,在进入各学科的专业主修课之前,设置共修的人文基础课板块。人文基础课的系列之一是中西方经典研读,“中国经典研读(《论语》)”课是这一系列中的必设课程。这门课与潘先生所说的“品格教育”关系尤为密切,可以看作是思政

课程与人文类课程的接榫处,其在基础文科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中具有特殊而又关键的意义。下面即以这门课的建设过程为例,谈谈课程思政在文科课程中如何落地见效。

一、革新方向之一:课堂模式

“中国经典研读(《论语》)”这门课,正因其思政色彩浓,知识陌生化程度低,与文科其他课程相比呈现出教学难度大、教学目标不易显现、师生双方普遍拒斥等负面现象。一般来说,专业课程中知识陌生化程度较高的课,对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的依赖度较低,所以博士毕业刚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一般会考虑先开设大学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积累了数年经验后再开设低年级的基础课。“中国经典研读(《论语》)”作为大学一年级的人文基础课,知识陌生化的程度可以说在所有文科课程中最低,小学课本中即已入选《论语》若干篇章,中学生对其中不少内容已有所了解,甚至有一些高中生已整本阅读过《论语》。因而这门课的教学效果最不理想,学生屡屡退课,评教

结果多次跌入全校的低谷。

经过多方调查和深入反思,笔者认为必须避免三个方面的积弊,方有可能激活这门课的生命力。其一,对于这样一门授课内容新颖度低的课程,要想方设法让学生在知识上、能力上和思想上均有所提升和增长。用教育学家谢维和先生的话说,必须充分关注学生们的“成长幅度”,学生因为修读了这门课,“在知识水平、能力水平、素质素养等方面”有多大的增量,“学生的变化有多大,或者他(或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这是课程成败的关键。其二,这门课的研读内容偏重道德教化,容易流于说教,要想方设法避免灌输、强塞和填鸭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让学生们从耳熟能详的“子曰”中获得启发,让孔子的话能够入脑入心,这是扭转困局的基础。其三,作为儒家经典中接受度最高、传承面最宽的《论语》具有解释多元化的典型特征,如何摆脱教师讲解的无权威感,建立师生之间的学术信任,关乎课程建设的方向问题。《论语》的注释,就连历代公认的魏何晏、梁皇侃、宋朱熹,近代唐文治、杨树达,现代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等名家注释,都无法囊括为一学期课程的教材,更何谈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等汇集性资料中所涵盖的成千上万种其他解读方案,而真要瞄准某一具体问题作精深研究,这些资源却又显得远远不够。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和史料面前,课堂上不管怎样力争兼顾,或再增加一种新解,都无法满足学生们多层次的期待。基于以上三项考虑,从2012—2016年,这门课获得了第一次全方位的重塑——课堂模式上的革新。

首先,建成经典研读圆桌研讨的小班教学模式。将原有的课堂规模缩小,严格控制在30人之内,实现师生零距离接触,彼此面对面对话。如果选课人数超过30人,则并行两个小班,当然教师的工作量会因此而增加。能够实现小班教学,课堂才能转变为以讨论、发掘、质疑、申辩为主,由原来主要教师宣讲,变成如今的共同研读,每一位学生必须全身心投入。教师在第一、第二次以示

范性方法引领学生们讲解文本后,全部的课程均为共同研讨,自由发问、寻求解答思路、体悟研究方法。教学资源 and 参考资料全部公开、师生共享,教师不再在资源上占据优势,师生平等地面对经典文本和前人成果。课堂对于教师来说具有强烈的挑战度,和原来可自我控制的讲授相比,如今作为讨论的引领者,要应对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蔓延的各种可能、滋生的突发情况,对教师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学生对待课堂的态度也有较大改变,主人翁意识增强,每一名学生的参与度均将实质性地影响课程的进度与质量。

其次,师生的课外任务量均大幅增加。为将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考虑得尽可能周全,教师的备课工作量激增。对学生而言,课程预习量大、课堂强度大、作业量大,这样才能真正打下文科所需的扎实根基。课程从尚未开始前的假期,就布置前期阅读材料,在第一堂课上提交读书报告,以后每堂课均布置下一堂课研读的章节和必读文献、发放预习讲义、提示问题与难点。课程设有三次大作业和两次人文实践。每一份作业均经过助教第一次批改、教师第二次批改,学生可依据最终修改版计算成绩。作业在师生间多次修改,师生双方彼此都高度付出,是一次心与心的碰撞、教学相长的过程,彼此的收获都是巨大的。由此,课程的投入时间比达到了课内外1:3,课外更高。

最后,将微沙龙引入课堂教学。当课程进行到第12周之后,学生研讨的良好习惯已基本形成,课堂讨论的氛围比较热烈,讨论的内容比较精深,加设一次微沙龙,可有效助推课程思政实现突破。“清华微沙龙”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宗旨是将各种学术思想火花的碰撞搬到咖啡馆等灵活自由的空间中,让咖啡馆成为“思想角”,各种观点可以激烈地碰撞,师生畅所欲言。有鉴于这门课的内容最终将进入学生学习生活的日常,延续至此后的学术人生中,适当将课堂与微沙龙对接,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是文科课程最应当具备的典型特征,即知识与能力不能停留在专业领域内,最终将融

入主体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中。

经过前后五轮的调整与磨合,“中国经典研读(《论语》)”这门课形成了以圆桌式小班研讨为依托,“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大作业量-人文实践(微沙龙)-微信群交流-师生平等-批判性思维”的一整套教学路径。其中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彼此制约,初步形成基础文科挑战性学习的有效教学模式。

二、革新方向之二:教学设计

课堂模式上的创新,让“中国经典研读(《论语》)”这门课走出了低谷步入了正轨,而真正高效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宗旨,有赖于这门课在教学内容设计上的革新,即第二次全方位的重塑。

开始时,只讲《论语》,不讲孔子。这门课通常的教学设计都是按研读篇目依次展开,即按《论语》二十篇的次第逐篇逐章讲授,如果感觉《论语》的体量不够,就扩展到“四书”,但是这样一来一学期的课时又不够。我曾经尝试采取以主题为线索,按仁、义、礼、知、孝、忠、信、勇……的思路将《论语》的篇章进行重组,仍然无法避免沉闷、冗滞的弊端。在一学期撇开杂务、沉浸式备课的过程中,有一天当我再度直面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警示时,恍然大悟。钱先生说:“从前人读《论语》,必然会看重孔子,乃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历来凡是讲《论语》的人,都会同样看重。今天最多是来讲《论语》,而对于从先秦下迄清代这许多比我在前的讲《论语》的,我都看不起。更可怕的,是只讲《论语》,不讲孔子。换言之,在我们心中,只有《论语》其书,更没有孔子其人。”^[3]这门课所犯的方向性偏离不正是“只讲《论语》,不讲孔子”吗,造成课堂讨论坠入故纸的汪洋而不知所归。

接下来,改为“孔子研读”课程。自2017年起,课程重心转回到研读“孔子”,而《论语》只是作为理解孔子思想的重要史料,起辅助作用。2018年,借助清华大学本科大类招生、课程体系重组的契机,将这门课改为“孔子研读”课程。如此革新之后的课程内容,可与中西方研究孔子的深厚传统完善对接,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一下子得到大大延

展。比如,1915年,梁启超就说过:“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试将中国史与泰西史比较,苟使无孔子其人者坐镇其间,则吾史殆黯然无色。且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搏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纽。”^[4]1933年,经学家周予同指出:“孔子问题是两汉以来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孔子问题不解决,则中国现在文化的动向无法确定。”^[5]2011年,在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看来:“全部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全部的中国学术不过是孔子的注脚。”^[6]由此,课程的核心问题就超出了纯粹的文本解释与辨析,而走向理解孔子在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占据何等地位这一广博的学术空间。

这一扇窗一旦打开,便会惊叹,几乎没有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有如孔子,如朱维铮所说的那样,孔子“身价随时涨落,人格上下浮动,封号屡次改变,作用代有异说”,甚至“孔子究竟代表进步呢,还是代表保守乃至反动”,^[7]都难以一锤定音。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留下天壤之别的评价,一方面仰止孔子“可谓至圣”,一方面却又留下“丧家之狗”的评语。胆大包天如王莽当年还只敢称“宣尼父”,唐玄宗竟尊奉孔子为“文宣王”,此后尊号不断升格,给孔子塑像行等同于皇帝的三跪九拜之礼,终究在清咸丰年间付诸现实。半个世纪后却已天上人间,打倒孔家店、废除孔学、吃人礼教的撕裂呼声已震彻云霄。朱先生说“假孔子的发育史,也就是真孔子的神化史”,究竟谁是“真孔子”,谁是“假孔子”,是否肯定五四就意味着否定儒家传统,弘扬传统就意味着鄙弃五四精神,所有这一切,均成为课程所要深入研讨的题中之意。

贯穿孔子伦理学说始终的“孝道”,是怎样在后世的实践中走样、变质、异化,成为“二十四孝”的禁锢童心,当“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8],于是迸发出鲁迅“救救孩子”的悲鸣。孔子心目中的礼,从“玉帛”“钟鼓”层面的礼仪,到礼教、到礼制、到礼法、到宋儒程颐的“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在这一礼之流行

中,怎一个“伪”字难敌,如果不洞察那些“正人君子”是“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怎样“假借大义,窃取美名”,^[9]又怎能挡得住鲁迅“吃人”的控诉。借助“几乎读过十三经”的鲁迅那一双慧眼,可以将孔子的“仁”、孔子的“礼”看到精深处,读出意味深长来。这是新时代践行古代学者“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10]的全新方法。2017年微沙龙的主题确定为“真假孔子”,2018年热烈讨论起“百年谁是‘真孔子’”,我相信孔子的思想、品格教育的宗旨已然在学生们的内心扎下了根。

最后,加入鲁迅、激活孔子,形成“孔子+鲁迅”的教学设计。来自于多年教学相长的心路历程,更来自于期间通读毛泽东主要著作的重要发现。2016年,清华大学举办第二期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班,2017年,举办哲学社会科学骨干教师专题培训会,借助这两次契机,我逐篇阅读《毛泽东选集》(全5卷)、《毛泽东文集》(全8卷)、《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诗词集》,完成表格读书札记近40万字,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这门课的主心骨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凝练完成。1937年,毛泽东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1]何谓“圣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12]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主干,鲁迅便是五四精神的浓缩,两位“圣人”的叠加正是为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寻求文明传统中那“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动力之源,而涤除属于“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的所有“旧教条”“新八股”,甚至“洋八股”^[13]。

经过这一番重塑的“孔子研读”课,在2017年、2018年清华大学的学生评教系统中已跻身本科生理理论课的前5%,同时课程的新教材编著也获得文科出版基金资助。至此,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已在这门课的建设中成功落地。

三、革新方向之三:思想引领

2019年,教务处希望将这门课建设成全校通

识课程,使覆盖的受众面超出文史哲专业。2020年课程正式开设,课程名调整为“孔子和鲁迅”课。从人文基础课走向全校通识课,不可避免地要部分放弃圆桌研讨的课堂,回到以教师讲授、启迪为主干,可适当保留两至三次小班集体讨论。同时,参与课程的学生主要来自理工科和社会科学,在课程阅读量的强度和难度上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非文史哲的学生为什么要来选修这门课,修了这门课能够让他们获得怎样的“思想增量”。须让课程继续革新,由此实现第三次重塑。

在通识教育的熔炉里,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更为集中地要为价值塑造铺路。孔子和鲁迅这两个人物的背后,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中华文明传统如何走向今天的中国,是绕开五四运动一味复古没有出路的问题,是漠视传统一味西化龃龉难通的问题……一句话,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置身其中、无法回避的切身路径问题。课程的核心关键技术,从那个历史上的“真孔子”,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寻找今天的“活孔子”。这是一个时代的困惑,有多元的可能、多重的困境、多种的曲折,是每一个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个体感同身受的心路历程。

各行各业的努力,都将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14]。那么孔子所代表的正是中华文明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对这一基础和文化基因理解不深、把握不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便只是一纸空谈。而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批判精神的吸取是创造性转化得以保持活力,不至于走向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坚强守护神。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15],最终为这门课注入了一个魂。这门课十年来的教学实践,正是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

本文系2020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同向同行’机制探索”(202010003003)、清华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人文学院人文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建设”(DX02_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五卷)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5.
- [2]谢维和.人才培养的清华风格[J].中国大学教学,2020(07).
- [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62.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60.
- [5]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朱维铮,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92.
- [6]Robert N.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M]. The Belknap Press, 2011: 409.

- [7]朱维铮.走出中世纪[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86-287.
- [8]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39.
- [9]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
-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44.
-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
- [1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83.
-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1.
- [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 [15]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J].历史研究,2019(01).

责任编辑:杜 华

(上接第32页)部门在构建学科规划、引领教师发展的相关制度上能够主动应变、守正创新。因此,提升课程思政工作质量,需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有力推动制度执行,进而加快构建体现育人新目标、新气象的新发展格局。

本文系2020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同向同行’机制探索”(202010003003)、2020年清华大学网络文化工作研究重点项目“网络思政与课堂教学高效协同的方法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7]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2021-01-05].<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

06/content_5517606.htm.

- [2]孙杰,常静.高校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现实路径选择[J].中国高等教育,2018(23).
- [3]戴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构探析[J].江苏高教,2020(12).
- [4]杨守金,夏家春.“课程思政”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05).
- [5]胡洪彬.课程思政:从理论基础到制度构建[J].重庆高教研究,2019(01).
- [6]陈宝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成教育强国[J].旗帜,2020(12).
- [8]习近平: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N].新华每日电讯,2016-12-09(01).

责任编辑:杜 华